

評介北村嘉惠 《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先住民教育史》

謝明如*

書名：《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先住民教育史》

編著者：北村嘉惠

出版社：北海道，北海道大學出版會

出版時間：2008 年 2 月 29 日

頁數：353 頁

壹

北村嘉惠，西元 1972 年生於兵庫縣出石郡，現任北海道大學教育學研究院助教。研究領域以近代臺灣原住民教育史、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為主。先後發表〈日本統治初期における台湾先住民教育と社会変容〉、〈台湾先住民征服戦争下における蕃童教育所の制度化〉等論文十餘篇，西元 2006 年以《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先住民教育史研究：蕃童教育所を中心に》取得北海道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。本書即是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，融合近兩年的論著改寫而成，可說是其原住民教育相關研究成果之集成。

貳

本書旨在以「蕃童教育所」為中心，考察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教育展開之過程及其特徵。作者指出，迄今雖有不少關於臺灣原住民教育之論著，惟多固守「同化主義」之論點，將「撫育」當作總督府實施原住民教育之意圖，視學校教育為「不證自明」的存在，因而對原住民教育在殖民統治中的位置，以及實施教育的現實條

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。

件均不甚明瞭。故本書主要課題有二：一在探討總督府創設蕃童教育所制度之原因及其經過；一在分析支持該制度的社會條件，以及原住民自身的態度和回應。在時間斷限上，則以就學率超過五成的西元 1930 年為下限。

基於上述問題意識，本書內容分為兩部。第一部（一～四章）從政治史的角度析論原住民教育政策、制度之形成；第二部（五～八章）從社會史的視角，探討教育所制度實施之情形及其普及的社會基礎。茲將各章內容簡介如下：

第一章「『殖產』與『治安』之間」，闡述總督府摸索統治原住民方法之經過。指出領臺之初，原住民蜂起反抗，從現實面觀之，樟腦大多分佈於原住民的居住地區，總督府為迅速確保財源，乃不得不尋求解決之道。西元 1896 年 3 月，在各地設置撫墾署，負責「撫育蕃民」、「製腦取締」及土地調查等事務，惟原住民對於伴隨武力而來的懷柔手段抱持強烈的警戒心，以致該制度因無法發揮預期的功能，而於西元 1898 年 6 月迅速廢止。

第二章「原住民教育的位置」，析論領臺初期，統治者對原住民教育之看法。指出西元 1900 年代以前，儘管部分地區已設置原住民教育機關，但在臺官員普遍認為從事原住民教育「時期尚早」，甚至有主張與其耗時耗財施予撫育，不如將之剿滅者。而參事官持地六三郎則直言原住民統治乃「經濟問題」，施予教育宜「以開拓山地所需者為限」。要之，係將原住民教化問題作為山地開發政策之一環，而非從「文明化」的觀點主張原住民教化之必要性。

第三章「原住民教育之契機」，以旋設旋廢的宜蘭「蕃人教化所」為例，探討原住民教育政策具體化之過程。作者延續第二章的觀點，指出自實施樟腦專賣制，設立樟腦局後，原住民反抗事件激增。有鑑於此，總督府一方面增加警力，加強取締交易行為；一方面以借貸槍枝為條件，「勸說」原住民移住平地，並讓子弟就學，俾於「有事之時」作為「人質」，學成後為原住民之「先導」。然而，該所自西元 1901 年開設後，始終未能獲得原住民的信任，學生漸減，旋於翌年三月關閉。其後，宜蘭廳政府放棄使原住民青年離社就學的計畫，嘗試以新的方式控制原住民。

第四章「蕃童教育所的創設」，旨在檢視教育所制度特徵形成之原因，指出西元 1903 年總督府於警察本署下設蕃務掛，達成「蕃政」一元化時，學務課長持地六三郎提出以「蕃童教育」作為「蕃地開發」手段之一的構想。西元 1908 年 3 月，總督府正式頒布「蕃童教育標準」，明示教育目的在「熟習日本風俗習慣」。而各廳在有限的經費下，遂限制收容人數，以勸誘頭目或有力者的子弟為優先。從課程觀之，以日語會話及實科為主。又，與《公學校用國民讀本》及日本《尋常小學讀本》相較，《蕃人讀本》之程度簡易，敘述方式亦有所不同。

第五章「『五年理蕃事業』終結後的原住民社會」，檢視五年理蕃事業結束後原住民社會之變遷。指出因總督府沒收槍枝，管制狩獵行動，使原住民紛紛放棄既有的生活方式，改從事勞動工作以維持生計。又，針對原住民社會死亡率偏高之現象，作者指出，其主要原因並非如官方所宣稱的「（原住民）文化程度低、衛生思想極為幼稚」，而係總督府強制實施集團移住，卻未提供充足的醫療資源，以致瘧疾蔓延的結果。此外，教育所亦為傳染病流行的媒介之一。

第六章「蕃童教育所的教師」，藉由分析巡查的民族別、語學能力、教育程度、勤續年數等，瞭解教育所的師資水平及其在職情形。結果顯示兼任教職之巡查，教育程度雖略高於整體平均情形，且四分之一具合格教師資格，惟「蕃語」能力則普遍不佳。據統計，西元 1931 年特別行政區之巡查中，持有甲種「蕃語」證書者僅佔 2.5%。因語言不通，授課困難，加以異動頻仍、職務繁重、配屬人員不足、社會對山地警察的評價甚低等，致使山地原住民教育面臨重重困難。

第七章「蕃童教育所制度之改編」，旨在檢證教育所制度因內在矛盾深化而改編之過程，並考察第二次「教育標準」之特徵。指出西元 1926-1927 年間，統合原住民教育制度之聲浪高漲，其主要論點有二：將「蕃童教育所」納入一般學校系統，置於文教局管轄下；抑或將「蕃人公學校」自一般學校系統分出，與教育所合併為「特殊學校」，惟最終改革案並未實現。基於「漢原別學」之原則，總督府於西元 1928 年頒佈第二次教育標準，增加學齡限制、修業年限、同學會、青年會等相關規定；警務局則配合編纂《教育所用國語讀本》，進一步強化了原住民教育機關之特殊性。

第八章「就學者增加的實像」，聚焦於西元 1920 年代以降教育所的就學實況、財政基礎、畢業生動向及鼓勵就學方案等。指出當局宣傳「就學率」提升的背後，實隱藏著「學齡」概念的變化及計算方法的變遷。待西元 1930 年「就學者」、「不就學者」、「學齡兒童」的定義明確化，計算法始趨於固定。大體而言，西元 1920-1935 年間，全臺教育所的「在籍率」呈「北高南低」、「男高女低」之態勢。另一方面，總督府因確實掌握「不就學兒童數」，遂積極研擬督促就學、出席之方策。弔詭的是，總督府既盼望擴大原住民的就學率，卻又希望受教者安於農耕生活，而對有意升學或從事公職者多所限制，充分顯示原住民教育政策兼具殖民性與現代性的兩面意涵。

參

自 90 年代「殖民現代性」概念逐漸突破傳統帝國主義論及現代化論的窠臼，成為殖民地史論述的新分析視角以降，研究者已逐漸打破「殖民者/被殖民者」的二元對立架構，探討殖民時期現代性傳播的多重歷史脈絡，以及被殖民者的文化主體性¹。無疑的，本書作者亦是在此研究觀點下，實證性地利用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》、《秘書類纂》、《後藤新平文書》、《隈本繁吉文書》、《理蕃誌稿》、《教育所台帳》、《臺灣日日新報等》等公私文書及報章雜誌，檢視臺灣總督府向原住民輸出近代教育之意圖、摸索過程、內在矛盾及負面效應，並解明原住民對新教育制度的迎拒和容受經過。

在諸多原住民相關研究中，筆者以為本書之主要貢獻在於跳脫「同化」的先驗性架構，解明西元 1928 年以前，原住民教育政策歷經摸索、調整至形成之過程。誠如作者所言，迄今雖有不少關於日治時期原住民教育政策及制度之研究，卻千篇一律地繼承、複製同化主義中心論，在同化政策的大前提下，探討原住民教育制度之創設與發展過程。而作者有意識地擺脫此一框架，從殖民地官員之言論、官方檔案等材料著手，實證性地指出設置蕃童教育所最初只是總督府衡量統治「成本」及「經濟效益」後所做的選擇，不宜以「同化」、「文明化」概括。

再者，作者以官方檔案為主要素材，卻能批判性地檢視表面論述與實際現象之落差。例如探討原住民的「衛生、疾病狀況」時，作者有別於其他研究者踏襲衛生官員議論之作法，仔細檢視地方衛生行政政策、瘧疾防遏施行對象之差異、集團移住地之疾病狀況及公醫配置情形等，指出原住民居住地疾病蔓延非因原住民自身欠缺衛生思想，而是「總督府施策之結果」。此外，對於一般認為「教育所不收學費，以官費維持，乃是支持就學率上升之要因」的看法，作者檢視教育所預算額、流用情形及視察官員之議論指出，教育所費用有相當程度為總督府挪作他用，其財政狀況貧弱，「從『教育擴充』之點觀之，意義極為有限」。再如指出學齡兒童定義及就學率計算法之變遷等，皆是發前人所未發，頗具創見之論。

在觀點上，作者採取批判殖民統治之立場，因而有不少與既有研究相異之論點。舉例而言，本書以《公文類纂》中的報告書、官員意見等，論證西元 1896 年設立之撫墾署因無法發揮預期的功能，甚至引起原住民的不安，成立兩年即被裁

1 關於「殖民地現代性」概念的興起、方法論特徵及其分析取向，請參閱張隆志，〈殖民現代性分析與臺灣近代史研究〉，收錄於《跨界的臺灣史研究—與東亞史的交錯》（臺北：播種者文化，2004），頁 133-160；Tani E. Barlow, ed., *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* (Durham: Duke University Press, 1997), pp.1-20.

撤。研究者松田吉郎除利用《公文類纂》外，另輔以《理蕃誌稿》、《民政事務成績提要》等資料，主張有不少地區的撫墾署已發揮「馴服」原住民、使其親近該署的功能，而林圯埔、嘉義等撫墾署在撫育、教育事業上更有一定程度的進展²。兩者看法不同，對撫墾署的評價兩極，其實際情形則有待更細緻的區域比較研究，始能論斷。

最後，就本書架構及內容而言，筆者以為有幾點尚待補強之處。首先，在架構方面：

- 一、題目與章節未緊密結合：本書以「日本植民地下的台灣原住民教育史」為題，其內容實以「蕃童教育所」為主，此外，時間方面未論及西元 1930 年代以降之發展，內容又相當程度地跨越教育之範疇，探討統治政策所導致的社會、經濟變遷。
- 二、時間斷限難以綜觀「原住民教育史」之全貌：作者以「統計上原住民就學率超過 50% 的西元 1930 年左右」為探討之下限，筆者以為有所不當。蓋西元 1930 年霧社事件發生，總督府於翌年公布「理蕃大綱」，原住民教育政策隨之有重大的調整。要之，西元 1930 年並非教育政策定著之終點，而係改革之起點。
- 三、所附資料、圖表未與正文充分結合：本書書末所附「資料編」，共收錄圖表 14 張及文字資料 27 種，前者包括地方行政機構變遷沿革表、教育所制度沿革表、在籍生數統計表等；後者則以「蕃人教育」相關之訓令為主，堪稱豐富。惜作者未在正文中註明，正文與資料難以相互對照，影響查閱之便利性。又，部分圖表如「台灣原住民族分布略圖」、「行政區略圖」、「台灣略圖」等，或與本文相關性不高，或過於粗略而無實用價值，似宜刪除。

其次，在內容上：

- 一、宜加強橫向與縱向之比較研究：隨著日治時期教育史各類主題的研究日趨深化，從事比較研究之重要性幾已成為學界共識。就本書觀之，橫向方面，至少有點尚待延伸之處。其一，地區的比較研究：如所周知，原住民教育的地方差異性大於漢人教育。松田吉郎即曾指出，西元 1908 年「蕃童教育標準」公布前，因未有任何施行原住民教育之依據，各地的教學理念、實際情形與設備差異極大³。本書以西元 1901 年宜蘭廳開設之「蕃人化育所」為例，指出

2 參見松田吉郎，《台灣原住民と日本語教育》（京都：晃洋書房，2004 年），頁 71-82。

3 參見松田吉郎，前引書，頁 79-99。

該所因無法獲得地方原住民的信任，一年後旋即撤廢。然而，是年 4 月，總督府特於教育費中增列「蕃人教育補助費」款項，擬於嘉義廳下設置「蕃人學校」⁴，三年後蚊仔只、達邦、白毛等蕃童教育所陸續開設，顯示創設「蕃人」教育機構並非宜蘭廳地方所獨有，且各地發展情形亦有所不同⁵。作者僅以一所為例論證此階段教育政策之頓挫，雖係受限於資料的緣故，仍難避免以偏概全之嫌。其二，教育內容的比較探討：作者指出西元 1914 年總督府出版的《蕃人讀本》有不同於《公學校用國語讀本》及《尋常小學讀本》之特殊教材，提示教科書比較研究之取徑，惜限於篇幅，未及深論。鑑於教科書係呈現教育內涵及意圖最直接的素材之一，未來實可更仔細地耙梳原住民、漢人及日人三方教材之異同，比較各讀本的課文編排、文字論述及插圖，以凸顯三軌制教育制度之精神和內涵。縱向方面，繼《蕃人讀本》之後，警務局於西元 1928 年另出版《教育所用國語讀本》，作為蕃童教育所專用之教材，究竟其內容與《蕃人讀本》有何差異？倘能進行不同時期讀本內容之比較，或可發現教育內涵之變遷。

二、欠缺教育現場之探討：本書雖然關注到教育所就學率、師資、財政等課題，卻未論及教學現場的實際情形，加以課程及教科書之相關探討不足，以致對於教育政策如何在課程中落實，以及教育內容與原住民社會結構、習俗、生活方式變遷之關係等課題，皆未能釐清。未來宜強化此一方面之論述，以檢證殖民政策、教育、社會變遷三者之關係。

綜上所述，本書以「政策形成」、「社會基盤」為二軸，探討原住民教育政策之沿革及其實踐情形，立體地呈現西元 1895-1930 年代前原住民教育之樣貌。其試圖在「同化」的概念之外，探討總督府實施原住民教育之意圖，並大量運用官方檔案、報章雜誌等一手史料檢視、修正相沿成習之說法，立論兼具開創性、啟發性與實證性，堪稱近年來原住民教育史研究之佳作。惟其欠缺教學現場之探討，未究明教育內容與原住民社會變遷之關連性，以及未顧及地區性差異等，為本書之缺憾。然而，瑕不掩瑜，期待未來作者能延伸比較史視角，並探討西元 1930 年以降原住民教育之變遷，一則可以補本書之不足，二則持續與相關研究進行對話和檢證。

4 〈新年度施設の蕃人教育〉、〈蕃人教育〉，《台灣日日新報》1901 年 4 月 2 日、5 日，二版、三版。

5 如達邦、白毛蕃童教育所開所後發展頗為順利，皆未受「蕃害」影響，尤其後者施教對象除「蕃童」外更擴及「一般蕃人」。筆者以為，箇中的順逆之別與地方社會條件息息相關，正是值得深入探討之處。參見《台灣教育沿革誌》第 484-485 頁。